

长江边的

CHANGJIANGBIANDEZHONGGUO

中国

DASHANGHAI
GUOJI DOUSHIQUAN
JIAN SHE YU
GUOJIA FAZHAN ZHANLUE

大上海国际都市圈建设与国家发展战略



上海证大研究所

学林出版社

长江边的

CHANGJIANGBIANDEZHONGGUO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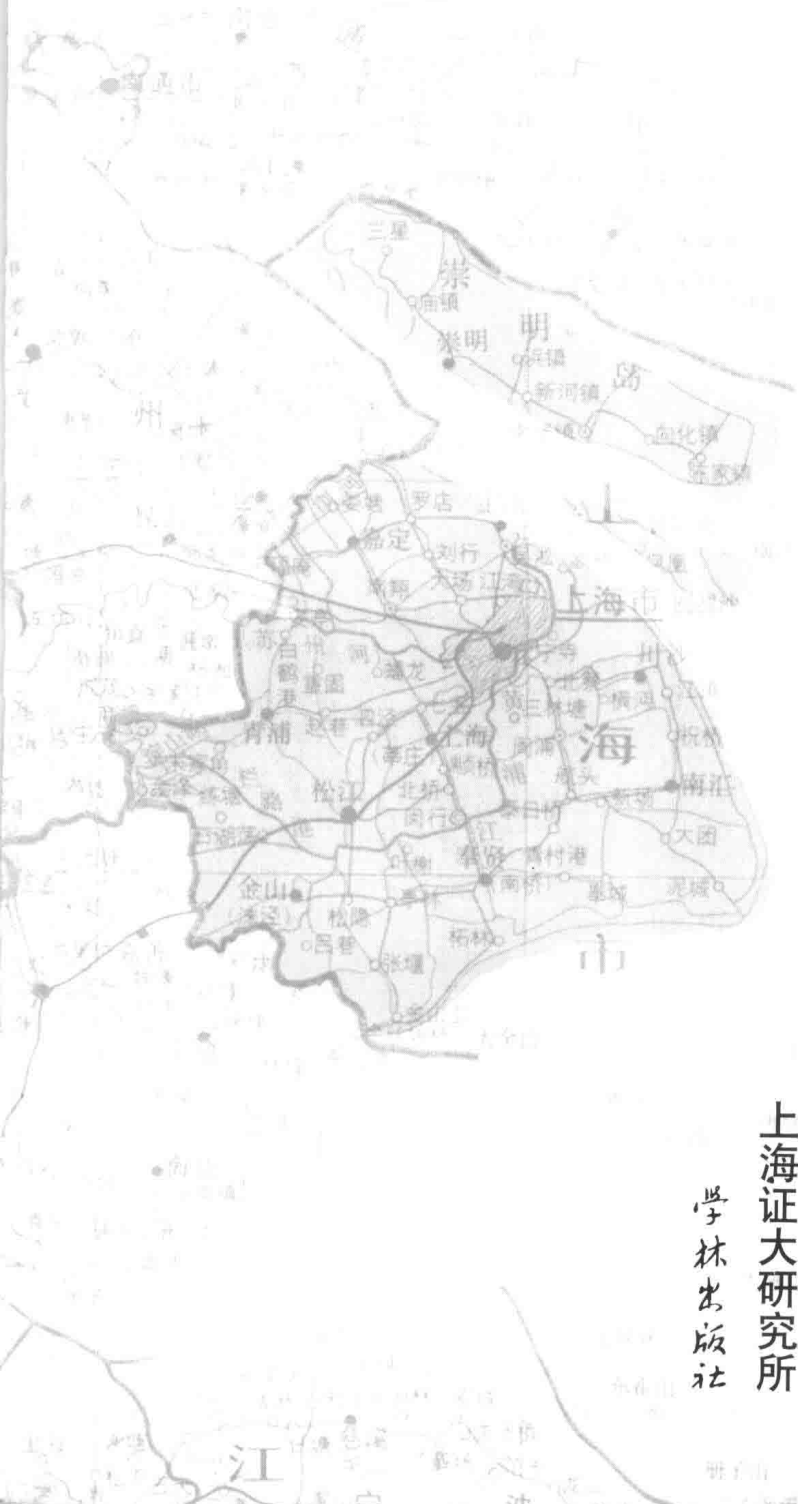
DASHANGHAI
GUOJI DOUSHIQUAN
JIANSHE YU
GUOJIA FAZHAN ZHANLUE

中国

大上海国际都市圈建设与国家发展战略

上海证大研究所

学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长江边的中国：大上海国际都市圈建设与国家发展战略 / 上海证大研究所编. —上海：学林出版社，2003. 3

ISBN 7 - 80668 - 505 - 7

I. 长... II. 上... III. 地区经济—经济发展战略—研究—上海市 IV. F127. 5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19212 号

长江边的中国——大上海国际都市圈建设 与国家发展战略



编 者——上海证大研究所
责任编辑——乐惟清
特约编辑——唐发铨
封面设计——赵 俊
出 版——学林出版社(上海钦州南路 81 号 3 楼)
电话：64515005 传真：64515005
发 行——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
学林图书发行部(钦州南路 81 号 1 楼)
电话：64515012 传真：64844088
印 刷——上海长阳印刷厂
开 本——850×1168 1/16
印 张——31.25
印 数——49 万
版 次——2003 年 3 月第 1 版
2003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3,000 册
书 号——ISBN 7 - 80668 - 505 - 7/F · 33
定 价——36.00 元

序一

戴志康

经过将近一年时间的努力,我们证大研究所对“长江边的中国——大上海国际都市圈建设与国家发展战略”的研究,已取得最终研究成果。借本书出版之际,我想在这里讲几句话。主要表达两层意思:一是我怎么会想到要组织上海、江苏和浙江三地的十多名学者进行本课题的研究;二是我们通过这一研究得出了什么结论。

我是一个民营企业家,主要经营房地产开发和证券投资,现在正在往酒店连锁及旅游业方面发展。同时,我又是新上海人,1993年开始在上海开拓我的事业。我的生活与工作实践经历驱使我去思索:我闯荡的上海这个天地将会是一方多大的舞台?或者说这片天地能为多少新上海人提供舞台?进而思索:上海做大做强的意义难道就在上海吗?上海的发展与我们中华民族的复兴有着怎样的联系?上海国际大都市地位的确立对中国及世界有着怎样的意义?最后还思索:目前是什么问题在阻碍着上海获取应有的地位?究竟如何使上海以更快的速度发展?上海应该按照什么样的模式发展?

1998年我举家迁入上海浦东并深入参与浦东的开发以后,亲身体会到了整个上海发展的速度和潜力。上海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深厚的现代工业基础和经济底蕴、开放的文化心态、与发达国家的密切联系、高效率的政府运作机制、蓬勃向上的城市精神……所有这一切都在告诉我,在浪迹天涯之后,最后落脚上海,我的路是走对了。

徜徉在上海的街头,目睹上海外滩那雄伟高雅的建筑,心里思索着上海曾经有过的辉煌。别看她今天又是高楼林立、车水马龙,但是距离她应该有的辉煌还相差甚远。要重振上海雄风,需要大家(不止是上海人)的百倍努力。不管是财力,还是人口数量等方面,都需要很多倍的乘数才能堆积出上海新的历史高度。

不过,今天我生活在上海,却又感觉不到大家已经认识到或者说做

到利用上海来发展中国。在当今已加入世贸组织的态势下,要想发展中国,不管怎么去想像或强调上海的重要性都不为过。

当然我也感觉不到现在所有的人已认识到或者能做到让上海充分发挥其潜力和扩张力,以至能扛起带动发展中国的重任。上海现行政策的着眼点和作用点主要是其现有的行政区划内的一千多万人口。

但是我认为,上海不仅仅是那一千多万上海人的上海,上海是十三亿中国人的上海。上海所蕴藏的地理、人文、经济、政治等资源及其扩张能力,应该让其承担起中国持续发展的火车头和经济中心的作用,让大上海(后面会有定义)承担起中国发展的半壁江山的作用。

我穿梭在上海浦东的大道上,看到了新的繁荣又在迅速兴起,听到人均 GDP 一万美元不久就能实现,让人感到似乎再紧赶几步上海就能进入发达社会了。承载着一千多万人口的这块土地,似乎就要轻松地飞起来了。作为上海人感到欣喜,感到自豪。可是作为新上海人,我又担心某种历史的局限,因为还有太多的人们想当新上海人,而现实是加入“上海籍”是如此地艰难。也许会发生这样的情况:列车还没有满载就急忙前行,甚至火车头不拉车厢就单独走了。紧跟着繁荣的是无可奈何的中断和消失,这是上海曾经走过的路,这也是上海的发展脱离民族全面发展而带来社会不平衡的结果。这种历史教训不能忘怀。我们不能使上海成为中国的一块“飞地”,不能让上海“孤岛式”地发展,不能再让革命或暴风骤雨式的运动来打断我们创造繁荣的连续性。

在上海呆久了会烦恼,会紧张,离开大都市去乡下走走,回老家(苏北农村)看看有益身心健康。这几年还老往西部去旅行,也亲身感受到了国家西部大开发的情景及效果。

驱车在丝绸之路上前行,从兰州到敦煌,借国家西部开发政策之力而新修的高速公路在脚下飞速展开,我感觉到了前无车、后无马的空旷,真是心旷神怡。可是我同时想到的是:国家财政投资的社会效益十分明显,但是又该怎样考虑经济效益呢?

驱车在青藏公路上,从兰州到格尔木,翻唐古拉山到拉萨,我真正体验了高原、雪山、苍穹给人的美感。但是在青海某地的景象让我震惊,满山遍野的牛羊密密麻麻,啃咬着高原薄薄的草甸,这使我想起了飞扬在北京街头的沙尘暴。

青藏高原,这一长江、黄河共同的发源地,如何保护其生态?更为重要的是,西部如何开发?

再说那苏北乡下，良田抛荒、杂草丛生，生活垃圾遍地，小城镇工业污染、废水在小河中流淌。土地不能为农民致富，农民在抛弃它，发展乡镇工业却又破坏着脆弱的生态。

农民愿意进城，愿意到上海来，可是上海给他们留出了多少空间？

在考虑中国整体的发展时，究竟怎样才能最有效地利用我们宝贵的资源和资本？

脑海里充满上述诸多问题，使我需要请教学者。我请教过著名学者曹锦清教授，他让我阅读他的大作——《黄河边的中国》，但是曹教授没有给出解决中国三农问题的出路。我再请教其他学者，及至把江苏、浙江、上海三地学者都请来了，共同研讨上海的发展与中国现代化的关系问题。我欣喜地发现专家学者们把这些问题都思考过了，而且往往比我想得更深入、系统。经过证大研究所近一年认真、严肃的研究，我们终于领悟到：要抓住机遇全力建设“长江边的中国”，特别是建设长江三角洲大上海国际都市圈。

我们得出的具体结论是：

一、在长江下游的三角洲地区及长江口两边的东部沿海地区建设世界级的大上海国际都市圈，并以此作为国家战略。中国的现代化应该走城市化的道路，而中国的城市化发展由于受其自然资源禀赋的条件约束，必须走集约化的大城市发展战略。在建设大都市过程中又应该优先考虑国际交往的方便，因此建设长江三角洲大上海都市圈是国家发展的必然选择。这是历史的选择、时代的选择，我们应当顺应这种必然性。

二、为配合国家中西部发展，上海大都市圈应该向中西部开放人口，引进上亿的移民在东部就业，从而使西部开发注重于生态性开发和旅游性开发，保护好整个中华民族长远发展的根基。

三、上海成功跨越黄浦江发展以后，应该进一步跨长江发展，直接跨过崇明岛，把整个苏北的东半片划入上海经济带。沿长江北岸、沿黄海之滨发展建立新的城市区域，而把崇明岛划作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苏北沿南北向的大运河为界一分为二，东部归上海，西部划江苏。上海的触角将伸到连云港，并通过上海的力量把江南经济强势引向北方，联合发展天然良港连云港，使上海经济辐射中原。

我们所梦想的大上海有三个层次的概念：

第一，现在的上海地域六千多平方公里，人口一千七百万，将来人

口三千万至三千五百万(简称“上海”)。

第二,扩展后的上海,现有的上海加上苏北的东半片,新扩展后的人口约二千五百万,将来人口五千万(简称“大上海”)。

第三,长江三角洲—上海都市圈,包括浙江、江苏和上海的十五个城市,地域约十万平方公里,共有人口约八千万,将来人口不少于二亿(简称“上海都市圈”)。

我们设想大上海的规划建设与上海大都市圈的建设应同步展开。通过二十年左右的艰苦努力把大上海和上海大都市圈都建成国际级的城市和都市圈,并能为更长远更纵深的发展打下新的基础。我们设想在二十年后,江浙沪三省市的常住人口各自都在八千万左右,这个地区将引进一亿左右的中西部人口,加上几千万的流动打工者活跃于该地区,这个地区将吸纳中国四分之一的劳动力,并支撑起中国经济半壁江山的重任。长江三角洲及沿海地区发展起来,形成世界级的实力,并将其势力溯江而上,向中上游辐射。今后长江边特大型城市还将包括相对独立的南京块、武汉块、重庆块。整个长江系可以养活中国半数人口,中国的希望在长江边。

如此多的人口向城市集中,如此多的人口向一个区域集中,如此多人口的一个国家集体走向现代化,如何探求这条道,我们除了进行经济地理分析以外,还引进了历史、政治及哲学的分析,希望能从多重视角来观测我们的设想。中国人必须走出独一无二的路来。我们的基本看法是:今天的地球无法再承受中国人过一种美国人那样的生活方式,像美国人那样消耗地球资源;当代政治,我们又不愿意用武力、强权来建立现代化的发展模式;中国人必须有中国人自己的现代化生活方式,这既是中国现代化的前提,又是中国现代化的必然结果,中国五千年的文化财富将为我们的现代化之路提供特别的智慧。

作为商人,我庆幸当今的社会给了我充分发挥才智的舞台,我们理应为国家经济发展贡献一个名牌企业。但同时作为一名中国现代化大潮中的弄潮儿,我希望自己的企业在中国乃至整个人类的历史上都能留下自己独特的印记。

我想了这么多,都是哲学给我带来的烦恼。2000年我参加复旦大学在浦东举办的哲学研究生班。两年的学习(利用周末时间上课),促使我对自己在生活、社会实践中遇到的各种问题进行思考和探索,同时也有幸让我结识了上海滩上的诸多学者,他们的真知灼见和循循善诱,

使我有了一点觉悟(或许是走入歧途)。在教授们的鼓励下,我们发起建立了证大研究所,逐步开展了对上海发展及中国发展问题的各种探讨,并陆续推出了一些学术成果。这次课题由复旦大学教授、证大研究所副所长华民教授担纲,之所以起名为《长江边的中国》,目的是想呼应证大研究所另一位副所长曹锦清教授在《黄河边的中国》一书中提出的一些问题。

证大研究所是民营企业与上海学界联合的产物。我们的工作模式和研究组织方式都处于探索的初级阶段。而作为初级阶段的研究成果,当然也需要社会各界的批评、指正。

在此感谢所有参与本课题研究的江苏、浙江、上海的学者和党政领导,并感谢学林出版社的积极配合。

2003年3月

序二

曹锦清

戴志康先生策划的《长江边的中国》完稿后，嘱我写序，我既怕找人写序更惧替人写序，但此次难逃其责，只好勉为其难了。

戴志康先生邀请华民教授等进行《长江边的中国》课题的研究，其目的之一是要回答我在《黄河边的中国》一书中提出的问题。我在《黄河边的中国》前言中承认：“我并没有找到能够有效地解释农村社会并指明现代化出路的理论。我期待于这部‘纪实’的只是替中原乡村社会保留一段信史。在所看、所谈之中夹杂着一些思考，这些思考还未形成理论，更多是一些关切与忧虑。”虽然我因该书的出版而被某些热心的评论者誉为“社会学家”，其实我只是一个三农社会的观者、思者与虑者，并没有找到一个足以使我的忧思安顿下来的“家”。而戴志康先生以及参与该课题研究的诸友站在长江之边东海之滨后盱前环，审视中国，指出了中国三农问题的出路的现代化发展战略方案，其思足以扩人视野，其对中国未来发展的乐观之情，足以使人感奋。

《长江边的中国》一书反复强调的一个基本观点是：“让这些生活在黄河边的农民继续留在黄河边是永远不能富裕起来的。因为问题的关键不在于黄河边的农民继续搞农业还是搞工业，而是在于黄河边的资源禀赋所能提供的产出就是只有这么多。要使黄河边的农民富裕起来或者是让全中国的农民都富起来，出路只能是把他们从贫瘠的土地上解放出来，通过向城市的大量移民逐步地走上城市化和工业化的致富之路。”据我所知，这一观点似已成为中国主流经济学界的一个共识。的确，在历史形成的人地关系高度紧张的条件制约下，共和国花费了三十余年的时间，通过大规模的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品种的改良与引进、化肥农药、机械设备的投入，使得单位产量极大地提高，从而基本解决于近十三亿中国人的温饱问题，一向处于饥饿状态的绝大部分中国人尤其是广大中国农民终于达到这祈盼已久的温饱状态，这或许是共和

国所取得的最令我们民族欣慰并让世界震惊的丰功伟业。但再向前看呢？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更大目标看呢？能够支持温饱的人均土地资源能否继续支持一个全面小康社会呢？答案是明确的然而又是否定的，那么出路在哪儿呢？戴志康先生、华民先生或主流经济学家给出的答案又是明确的：只有大规模地减少农民，才能富裕农民。“大规模”的边界何在呢？理论上是全部农业剩余劳动力。若按现有的农业技术装备来对中国全部耕地进行规模化经营的话，据专家的估计，维持现有产出只要一点二亿左右的劳动力。中国现有户籍农民人口近九亿，其中劳动力近五亿，这样，中国现有农村剩余劳动力三点八亿，这里提出的一个十分现实的问题是，要多大的城市工业规模才能吸纳如此庞大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呢？如此庞大的城市工业规模将需要多少世界经济和世界市场呢？如果再考虑到中国人口的动态增长及农业机械化水平的提高，问题将更加复杂，当然只有大规模地减少农民才能富裕农民的发展战略——就发展战略而言是完全正确的。

其实，“无工不富，无商不活”，这一观点在 20 世纪 80 年代中晚期已成为全民共识。全国三十余个省市自治区，两千余个县和县级市，四万余个乡镇，六七十万个行政村几乎都卷入“工业化”的浪潮，这场以地方政府主导的工业化发展战略在东部沿海地区与中西部地区造成了相当大的差异，在中部乡村除了凭借当地特种地下、地面资源的乡村企业幸存下来之外，其他的差不多全军覆没，留下的只是债务与怨恨。而长江三角洲（包括江浙）、珠江三角洲，及环渤海湾的乡村企业却迎着市场风浪而快速成长。华民先生在《长江边的中国》的主报告中对这一“平均用力”的工业化发展战略提出重大疑问，在他看来，近二十年来东部沿海地区快速的工业增长决非“中央政策”等人为因素的产物，而是具有深刻的历史文化背景、区位优势及市场经济本身的内在逻辑，因而，中国工业化发展战略，也就是沿海工业发展战略，确切地说是以上海为中心的长三角，以深圳、香港为中心的珠三角，以京津为中心的环渤海都市圈发展战略。中国土地资源的高度稀缺也只能迫使中国走类似于日本东京、大阪都市圈的工业化城市化发展之路，而决不能走两千余个县城、四万余个乡镇齐头并进的中小城市发展之路。事实上，在中西部缺乏工业化依托的、以政府财政贷款或集资为投入主体的城市化建设，是难以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

要使中国若干大都市圈来吸纳数亿农村剩余劳动力以解决当代中

国社会经济最重大的问题——就业问题，华民先生认为中国决不能逾越以制造业为中心的工业化阶段而走以资本技术（知识）密集型的后工业化之路。这样说，并不是排斥知识密集型产业，而是说，不能以知识密集型产业作为中国主导的发展战略。相反，知识密集型产业应有效地与制造业结合起来，为劳动密集型产业服务。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难题在于农村积压着过量的剩余劳动力，但中国经济的比较优势也在于此，只有以劳动密集型的制造业为主导的工业化城市化发展战略才能将劣势转为优势。

如何使亿万进城打工的“农民”转化为各大都市圈的新移民和居民？《长江边的中国》一书提出建议：一是将分配给农民的承包土地市场化、货币化，以土地换取城市社会保障，并给农民提供初始的迁移安置费用；二是彻底取消城乡割离的户籍制，赋予农民以国民待遇。第一大建议的实质是土地私有化，这可是一个极大的经济—社会问题，甚至是当代中国的一大政治问题。在人均耕地一亩左右的情况下，耕地既是一种生产要素，更是数亿农民的基本生存与安全保障，一旦失去了土地且又在城市谋生的人们形成一个庞大的社会阶层，何以保障中国发展所必需的社会稳定？至于土地私有化后形成的土地价格，能否“购买”城市社会保障与城市安置费用，这更是一个悬而未决的大问题。在我看来，除非中央财政强大到足以把失业、医疗、养老三大社会保障覆盖到全体中国公民，否则千万要慎言土地私有化。

我认为，戴志康先生以及华民教授等人的所有这些设想都是非常具有创意的，这部著作中所提出的许多问题一定会引起上上下下的注意，这实在是件好事。确实，《长江边的中国》倾注着作者们对中国现状与发展前途的深切关怀，洋溢着对中国未来现代化前景的乐观主义精神，而其中的观点也将给中国学术界拓展思考、争论与想像的巨大空间。

目前国内各界正在讨论中国如何抓住 21 世纪前二十年这一重要的战略机遇期，壮大中国的综合国力，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本书主张把发展“长江边的中国”，把建设大上海国际都市圈作为一项国家战略，这无疑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全新的思路，而这也就是本书的意义所在。

2003 年 3 月

目 录

序一	戴志康 1
序二	曹锦清 6

主报告

长江边的中国——对中国经济城市化发展的思考	1
-----------------------------	---

引 言	2
-----------	---

第一章 中国城市化发展的国际背景	21
------------------------	----

第二章 中国城市化发展的内部动力	91
------------------------	----

第三章 现代城市发展的一般规律	156
-----------------------	-----

第四章 中国城市化发展的路径选择	184
------------------------	-----

第五章 中国城市化发展的战略	244
----------------------	-----

分报告之一

把长江三角洲地区建设成为世界级的大都市带	322
----------------------------	-----

分报告之二

长江三角洲：国际大都市圈与中国现代制度成长	345
-----------------------------	-----

分报告之三

长三角国际大都市圈战略的文化基础与文化意义	372
-----------------------------	-----

分报告之四

长江三角洲地区经济一体化的历史与文化基础	395
----------------------------	-----

分报告之五

长江三角洲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市场基础	433
---------------------------	-----

分报告之六

长江三角洲的发展目标定位与一体化组织的构建	449
-----------------------------	-----

分报告之七

大都市连绵带的基本概念与国内外的典型实例	469
----------------------------	-----

本报告编写人员名单	487
-----------------	-----

主报告

长江边的中国

——对中国经济城市化
发展的思考

引言

自从进入 21 世纪以来,中国成为世界经济中最具有争议的国家之一。各种各样的学者都在对中国经济与社会的发展提出自己的看法。而且,一种非常有趣的现象是,国内的学者大多对中国未来的社会与经济发展抱比较悲观的态度,而国际上的学者却大都要比中国学者持更加乐观的看法。

从《现代化的陷阱》到《黄河边的中国》,再到《中国即将崩溃》,从哲学家到社会学家,再到经济学家,有太多的人认为中国的现代化是不可能的或者是根本不可行的。他们的主要理由是:中国是一个农民的国家,中国的现代化会导致农民的更加贫困;现代化只是有利于少数社会特权阶层,这样的现代化会激化中国社会的各种矛盾,从而使中国的现代化陷入不可自拔的陷阱之中;中国的现代化会使中国的传统文化被世界的主流文化所淹没,从而使得中国变为一个没有民族灵魂的国家。

来之于国际社会的看法却刚好相反,“中国人在创造世界奇迹”,“中国正在成为世界工厂”等说法,几乎已经成为全球的共识。假如不信,每年那么多的国际资本流入中国来投资和套利就是一个证据。

面对这两种截然不同的看法,我们究竟应当怎样来看待中国社会与经济的发展呢?正确的做法应当是综合。因为,按照黑格尔的思辨逻辑,只有通过“正、反、合”的逻辑思考,我们才有可能得到一种崭新的认识,到达一种更高的思想境界。

通过对以上两种不同观点的研究,我们发现,中国正在走向民族复兴和经济起飞的道路,但是,由于在发展战略和策略上存在着某些缺陷,以致在中国经济和社会飞速发展的进程中出现了一些比较严重的问题,从而给未来的增长带来了许多困难。其中最为重要的一个失误,就是始终未把城市化放到中国社会与经济增长的首要位置,由此造成的后果是中国二元经济和社会结构的固化,从而使得中国的广大农民不能分享中国最近二十多年经济增长的成果,城乡之间的差距与矛盾也因此而变得越来越尖锐。

悲观论者被这种矛盾所吓坏,以致得出了中国即将崩溃的错误结论。其实,二元经济和社会结构,恰好是中国经济发展和增长的一种非常宝贵的动力来源。只要政府的发展战略是正确的,二元经济和社会结构下的无限可以供给的廉价劳动力,是中国经济发展最强大的动力和国际竞争力。那么什么样的发展战略是正确的呢?回答是能够把中国广大农民整合到工业化发展进程中的城市化发展战略才是正确的,而那种寄希望于扶贫等再分配机制让农民富起来的做法其实是根本无效的。进一步的研究还可以发现,加快中国经济的城市化发展不仅可以缩小城乡之间的差距,而且还可以增加中国的内需,因为只有当广大的农民富起来时,中国才有足够的内需来保证经济的可持续增长。就目前全球经济正处在紧缩期,从而外部市场需求趋于衰减的时候,通过加快城市化来增加中国的内需对于当前中国来说就具有更加重要的意义。

一、中国城市化发展的国际背景

自从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世界经济发生了一系列结构性变化,这些结构性变化使得中国的外部市场需求有相对缩小的发展趋势。

第一个世界经济的结构性变化就是经济全球化。经济全球化可以理解为世界经济的空间结构的变化,因为经济全球化就是通过市场机制把更多的国家和地区联成一体,从而导致市场经济的空间扩张。

经济全球化的动力来源于以下三个方面:由原计划经济国家经济改革而引起的宏观经济体制的趋同,这种改革扫除了不同国家之间的体制障碍,使得商品和要素可以在世界范围内更加自由地流动;跨国公司的全球套利活动促进了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信息技术的发展导致远距离控制和交易费用的大幅下降,从而使得企业的活动半径大大扩大。

由于经济全球化的过程就是市场经济在全球扩张的过程,而市场经济是解放生产力的,因为它把为生产活动的目的由满足自己有限的需求变成成为满足市场的需求,因此只要市场是扩张的,生产就将不受限制。

但是,在经济全球化导致世界供给总量迅速增加的同时,世界的总需求却未能跟得上世界供给总量的增加。世界总需求的增长为什么会赶不上总供给的增加呢?从时间序列的角度来看,其原因就在于人们总是先有生产活动获得收入,然后才有货币支付能力进行消费,再加上

人们不可能一辈子拥有劳动能力,人的生命周期大致可以区分为两个时间段,年轻时就业获取收入,年老时退休消费,为了保证年老退休以后能够与年轻时拥有相同水平的消费,那么就必须在年轻时进行储蓄,这种理性的跨期均衡行为,也将使需求相对于供给而出现时滞。因此,当经济全球化在造成世界市场供给总量增加的同时,极有可能因为需求增长的滞后而引起生产过剩的危机。这种全球性的生产过剩的危机首先会把那些高成本的国家淘汰出局,同时也将使那些仍然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国家面临外部市场需求相对缩小的不利局面。

第二个世界经济的结构性变化就是世界经济从汽车作为主导产业的长周期进入到以 IT(信息)产业为主导产业的长周期,我们把这种周期变化定义为世界经济的时间结构的变化。

世界经济的这种周期变化源于微观经济领域中的产品生命周期。正如美国经济学家熊彼特所强调指出的那样,能够对企业的产品生命周期作出积极反应的只能是企业家,因为企业家的人力资本的价值是与企业的寿命牢牢地联系在一起的。这种创新最初是个别的和分散的,当创新成为一种丛生现象的时候,一次能够改变社会经济面貌的产业革命便会发生,世界经济也因此而从一个旧的周期进入到一个新的周期。

从第一次产业革命至今,这样的周期已经发生了五次,它们分别是:(1)以纺织工业为主导产业的世界经济周期;(2)以钢铁工业为主导产业的世界经济周期;(3)以石油重化工为主导产业的世界经济周期;(4)以汽车为主导产业的世界经济周期;(5)以及以 IT 产业为主导产业的世界经济周期。

每一次世界经济的周期变化都会不同程度地引发世界性的生产过剩的危机,这是因为,每一次新周期的到来都会引起世界总需求的重新分配,大量的需求会从老周期的主导产业部门转移到新周期的主导产业部门,从而使得大部分没有能力通过技术创新来改变供给结构的国家面临市场萎缩、增长减速,直至走向衰退的痛苦局面。日本在以汽车为主导产业的世界经济周期和以 IT 产业为主导产业的世界经济周期的转换期被淘汰出局,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

第三个世界经济的结构性变化就是世界经济的增长结构的变化。从古至今,世界经济增长从来都不是平均地发生在地球的每个点上的。由于世界经济的增长具有不平衡的性质,所以它在增长的结构上总是

具有“中心与外围”的特征。正是世界经济的这种“中心与外围”的增长结构,决定了世界经济的增长需要由火车头来拉动,而能够作为火车头来拉动世界经济增长的也只能是那些强大又发达的中心国家。

进入 20 世纪下半叶以来,世界范围内的和平带来了持续的经济增长,再加上由技术进步所造成的生产率的普遍提高和经济全球化的迅猛发展,全球性的生产能力过剩已成事实,在这种情况下,拉动世界经济增长的火车头国家为争夺有限的市场,先后开始推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做法,其实质就是想通过市场的内部化来把世界市场加以区域性的分割。由此产生的后果是,世界市场相对变小了,那些没有组建或者参加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国家和地区所能够获得的国际市场份额更是显著地下降了。

在世界市场因为区域经济一体化而被分割得七零八落的时候,更加可怕的事情发生了,从 20 世纪 80 年代末期开始,拉动世界经济(至少是区域经济)增长的三台火车头先后熄火了。首先是日本,伴随着 1988 年泡沫经济的破灭,无可奈何地走上了经济衰退的不归路,东亚地区的经济高增长戛然而止。紧随日本之后的是德国这台引领欧洲经济增长的火车头也熄火了。德国火车头的熄火是由一系列的事件造成的,概括地讲,主要是这样一些事件导致德国火车头的熄火:德国保守的主办银行制度使得德国失去了发展新经济来实现经济增长的极好机会;民主德国和联邦德国的合并不仅没有能够激活德国步履艰难的经济,反而带来了通货膨胀、资本外流的消极影响;欧元的启动和正式流通也没有能够为德国经济带来增长的机会,德国反而因为需要承担保持欧元稳定的承重负担而陷于进退两难的境地。当人们把世界经济的安危寄托在美国这台真正属于世界级的火车头的身上时,美国这台火车头也终于因为抵挡不住一系列的内外打击而熄火了。2000 年,反映新经济发展态势的美国纳斯达克股票市场开始暴跌,这意味着新经济周期已经开始从周期的上升阶段向着周期的下降阶段转变,经济的基本面已经不再支持美国经济的继续增长。2001 年,美国又发生了震惊世界的“9·11”事件,这一事件的发生使得美国经济从增长减速急剧演变为经济衰退。到了 2002 年,美国又遇到了更加严重的制度危机,那就是美国大公司相当普遍的财务造假事件被一一披露,从而使得美国 and 全世界的投资者对美国大公司的管理层完全失去了信心,大量资本的外流,把人们对美国经济增长仅存的一线希望打破了。由此造成的